

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



鸡鸣丛书

刘俊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106/134

2007

 鸡鸣丛书

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



刘俊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985 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成果
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刘俊 著. - 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

(鸡鸣丛书. 第2辑)

ISBN 978-7-02-006724-4

I. 世… II. 刘… III. 中文-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811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李 博

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

Shi Jie Hua Wen Wen Xue Zheng Ti Guan

刘 俊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6724-4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总 序

董 健

我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鸡鸣丛书”第一辑共十种,在学术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我们又出版第二辑共十种。

丛书取名“鸡鸣”,固然会叫人想到它的地方特色(南京有鸡鸣山、鸡鸣寺),也隐含着表彰勤奋、良知之意(所谓“鸡鸣而起,孳孳为善”)与呼唤自由、光明之意(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但在我们研究中心来说,首先还是出自一种希望建立一个学术高地的“野心”。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挂牌不少,然而“基地”如果仅仅去“填报表”、“出数字”而枉费精力,却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高地,那就徒有其名。“鸡鸣”之称自然会唤起一种学术高地的意念。为什么这么说呢?鸡鸣山是巍巍钟山伸进南京城内的一脉,早在明朝初年(14世纪),此山就是“国子监”之所在地,用今天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大学城”。清朝末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2年始),就坐落在这个昔日大学城的遗址上,此亦属我国现代大学源头之一,当时号称“最为新政大端”。三江之后是两江师范学堂(1905年始)、南京高师(1915年始),再接下来就是东南大学(1921年始)、国立中央大学(1927年始)、南京大学

(1949年始),悠悠百年,延绵不断,这座鸡鸣山就是学术高地的象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这样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也与中央大学为邻,紧靠在鸡鸣山的怀抱里。即使是在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最腐败不堪的年头,大学和研究院这样的学术和精神的高地也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整个社会上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清流,抗拒着滚滚而来的社会浊浪。1948年鸡鸣山下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作为一个体制化行为而高度体现了政治上的宽容与学术上的自由,这是近年来知识分子颇为乐道的一段佳话。当时选出的院士,人文组二十八人个个都是学界巨子,即使在政治上为当局所不满的左翼学者如郭沫若、马寅初之辈,亦名列其中,而有些颇得官方赏识的学者却名落孙山。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学术的权威由是而立。显然,建立学术高地,不仅要严防社会腐败之风(目前此风正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对学术界的侵袭,而且要时时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对此,我们有颇多的感慨与期待,同时也是怀有信心的。

其次,看中“鸡鸣”这个名字,还因为鸡鸣山上有座鸡鸣寺,鸡鸣寺里有座豁蒙楼。古寺的晨钟暮鼓,往高处讲,自然可以引出一些有关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话题,这里且不去说它。单是这豁蒙楼,就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颇有些警戒的意义。豁蒙之义与启蒙相通。中国人吃尽了受蒙蔽之苦,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说“五四”启蒙早已过时。然而看看近十多年的文学界吧,譬如,不久前我还看到一位法学家竟然出面捍卫“样板戏”里的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这种种怪现状不都在说明着未经启蒙的精神蒙昧吗?我们的文学研究难道对此能漠然视之吗?

豁蒙楼是张之洞在创建三江师范学堂两年之后,也就是戊戌

变法失败六年之后，为纪念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修建的。杨锐为政治改革触怒专制主义而掉了脑袋。张之洞重游鸡鸣寺，忆起甲午中日战起之年与杨锐同登此寺置酒畅谈、纵论古今，为国势陆危而痛叹的情景，似乎对当年学生吟味杜甫“明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的诗句又生出了一层系于现实的解读，遂倡议起楼，并亲笔题“豁蒙楼”匾额。看来，一切有点求新、求变头脑的人都有一种反蒙蔽的焦灼感。豁蒙者，解蔽也。看清了遮盖、蒙蔽之物而将其揭去，叫人心明眼亮起来。这既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譬如在鸡鸣寺建此楼之时，为了登楼远望，一览湖光山色，张之洞要求尽伐近边的丛木，这就是给自然景观除去了遮蔽。精神上的豁蒙当然是更加困难的。中国古人讲“正心”、“明道”、“解惑”、“劝学”、“致良知”等等，多少也有些精神豁蒙的意思在，但在那个专制主义文化的大框架之内，所谓豁蒙往往转来转去又变成了新的蒙蔽。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施蒙蔽之术，此为铁律，谁也破除不了的，即使在当代亦难免。就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吧，我们至今还记得，人一犯错误就检讨说受了蒙蔽，然后被“代表正确”的人教导一番，“心明眼亮”地去“战斗”，但不久就又有新一轮的“正确者”来宣布你再一次受了蒙蔽。清华大学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何以至此？等到“文革”噩梦一醒，才知道当时全民都处在一个精神蒙昧的时代。

真正的思想精神上的豁蒙，现在叫启蒙(enlightenment)，这是从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运动才开始的事。在中国，五四启蒙打开了人的思想、精神的新境界，是人与文学的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是，老的“左派”说，启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已被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所取代，现在再讲启蒙，就要“启”出反党的思想；“新左派”则说，启蒙是西方来的“殖民话语”（按：此言本身倒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殖民话语),要捍卫我民族独立性,应拒之国门之外。马克思主义只能吸纳、包容而不可能颠覆、取代启蒙主义。有些新派论者以“审美现代性”否定“资产阶级现代性”中的启蒙精神,也是很片面的。只要你承认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具有共同与共通之处,你就不能不看到现代启蒙的核心精神之所在,这就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明眼亮之人;告别迷信盲从状态,做一个明理自觉、个性健全之人;告别视官、上司为父母、为老爷的传统的臣民状态,做一个敢于捍卫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凡此种种,中外先贤多有系统阐述,虽是老生常谈,至少在中国却并未过时。凡此种种,关乎民生、自由之制度建设,均为人类共同与共通的追求,早已超越了阶级与国度,没有什么你强加于我、我强加于你的问题。这里用得上孙中山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文学拒绝启蒙,便不出政治工具与庸人玩物两途,这当然是我辈同仁所高度警惕的。至今还有不少入将“启蒙”与“政治”混为一谈,将“去政治化”与“反启蒙”作为一件事。岂不知有些政治行为本身,如果它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它就必然是以蒙蔽人民为前提的。

在此,“鸡鸣”之称中的一个“鸣”字,至今仍不失其对文人学子的一种莫可名状的诱惑力。吾辈既为文人学子,便不可不思;思而有得,便不可不鸣;鸣而遇到不同之见或受权威压制,便不可不进而争、进而再鸣。如此往复无已,学术便得到发展。1957年“大鸣大放”虽然吃了苦,但人们至今难以忘怀那个短暂的学术春天所显示出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气。最近十多年来,学术环境相对来说比以前是宽松得多了,“多元化”的口号也叫得颇为响亮,但总也形不成“百家争鸣”的局面。鸡零狗碎、庸俗不堪、充满广告味的“热点”(如文学界为所谓“名誉权”打官司之类)倒是不断出现,也

时有某某领域某某人有某某“新说”、某某“新论”的报道,但多为炒作,认真严肃的学术争鸣却是没有的。归根结底,这是学术界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的萎缩所致。简单化的、直线的“两元对立”(alternative)的思维模式已经使我们的学术受害匪浅。要神话鲁迅,就必把胡适妖魔化,或者反之。为了冲破“鲁郭茅”的评价格局,便非把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抬得更高不行。这种非此即彼的视角,叫人辨不清历史的真实色彩。很少有人从综合的文化效应上,从人与文学之现代化总趋势上,去研究鲁迅与胡适的共同价值及其在今天的意义。如鲁迅主张改造贯为人奴而麻木不仁的“国民性”,张大“个性之尊”,呼唤“人国”之建立,胡适则鼓吹健康的“个人主义”,这在人的现代性追求上是一致的。又如关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再造,鲁迅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胡适则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者相通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一定要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首先被丢弃的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再比如,现在讲“民族性”、“民族精神”很时髦,但很少有人从鲁迅、胡适已达到的思想高度上来揭示“民族性”、“民族精神”之反现代性的巨大负面影响。只顾顺着“国情”、“中国特色”去讲,所谓“中国化”就往往不是化向新、化向现代,而是化向旧、化向前现代、反现代,就像鲁迅所说的:“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深度争鸣的缺失,还因为我们往往在貌似“多元化”的众声喧哗中,找不准价值的定位。主张“多元化”,提倡学术上互相宽容与尊重,决不意味着无比较、无权衡、无轩轻、无选择。面对互相对立的思潮与倾向,不偏不倚而“执中”就行了吗?孟子子说得很明白:“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里讲的这个“权”字非常重要。权就是秤锤,没有它,你无以知轻重。所以孟子认为,没有权衡的“执中”仍

是片面的、偏于一端的“执一”。现在有些貌似很“公允”、很“折中”的理论,其实是很褊狭的。褊狭之风与浮躁心情有关。孟子在讲到无“权”之害时,举了个生动的比喻:饥不择食、渴不择饮的人,别看他吃喝得津津有味,但其实他是得不到“饮食之正”的,因为口腹的“饥渴之害”使他不暇掂量、选择,不能沉着、从容地做事。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后现代”的鼓吹者,有时就会露出这种“吃相”来。这样吃,就难免从垃圾里吃出“美味”——比如,从“文革”里品出“民主意识”,从“样板戏”里品出“后现代性”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个既有价值定位又不定于一尊的深度争鸣的人文环境,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

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评论与研究,说到底就是苦心孤诣地把那么一点“思”、一些“感”用语言表达出来。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言说”(discourse)。说什么?怎么说?这是言说水平的问题;向谁说?听谁说?这是言说对象的问题。心之所感有正邪,思之所得有深浅,言之所形有是非,这里边是大有讲究的。大抵古人早就感到了言说之难吧——晋朝有个叫宋处宗的人,家养一只会说人话的长鸣鸡。这位宋先生就是在与鸡的对谈当中“言功大进”,即大大提高了言说的水平。故而古人著书立说多称“鸡谈”、“鸡谭”云云。这个故事见于南朝宋刘义庆辑录的《幽明录》,那时的人看重言谈之功,才会编出这么一说。鸡当然是不可能说人话的。这一方面说明古人亟欲提高言说水平的迫切性,一方面也说明言说对象之难以到位的困惑与无奈。与其对牛弹琴,不如沉默与独语。与通人语的鸡对谈不是比与不通情理的人对谈更有益吗?我们的“鸡鸣丛书”当然面临着当代世界的言说之难。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听谁说?”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矩。这些概念和规矩,一直都在牢牢地统治着我们的头脑。如今,必须对它们

——加以梳理和甄别,有些应该被质疑、被替代、被颠覆。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当然是困难的,但我们会在困难之中言说出新的水平来,这样,也就会逐渐建起学术的高地。

2007年6月22日改定

前 言

《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这一书名,套用的是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在书中,陈思和从总体上打破此前相对“稳定”的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从观念、范围和方法等方面,冲破旧有的模式,以世界文学为参照,贯通现当代文学,建立起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认识。

陈思和对中国新文学“史”的突破后来有所发展,他的“整体观”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仅限于纵向的现当代(新)文学的打通,而且在横向上也开始向近代旧文学、现代通俗文学和台港文学延伸——也就是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新文学中心主义”(排斥传统“旧”文学)、“精英(雅)文学中心主义”(轻视通俗文学)和“大陆文学中心主义”(无视台港澳文学),在陈思和新的“整体观”中,已经有意识地加以瓦解。

陈思和的新的“整体观”,预示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未来新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逐步认识到“新文学中心主义”、“精英(雅)文学中心主义”和“大陆文学中心主义”的局限,开始有所纠偏。在传统“旧”文学的价值和地位的重新认识,以及对通俗文学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方面,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前者以海外学者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为代表,后者以范伯群的插图本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为标志。不过,相对于“新文学中心主义”和“精英(雅)文学中心主义”的有所改观,至今为止,“大陆文学中心主义”的状况却未见有多大改变。从观念上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台港澳文学的“在场”对于完整地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性,可是由于获取资料的不易,以及知识储备的不足,在具体践行的时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在总体上显得力不从心,颇感举步维艰^①。

倒是行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边缘的一批学者,在进行台港澳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有意无意间,将“中国大陆文学”代入到“台港文学研究”中,改变了“大陆文学中心主义”的形态。黎湘萍的《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的写作与台湾的文学精神》、《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赵稀方的《小说香港》;朱双一、张羽的《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等著作,都是在立足台港文学研究的同时,兼顾了对大陆文学的观照,如在谈陈映真时,涉及到了与鲁迅的比较;在论台北时,对照了上海的情形;阐释香港,没有忘了大陆的参照;综论台湾的文学思潮,则时时追溯其大陆渊源……这使得这些论著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论述——只不过它们不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大陆为本位)为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是以“台港文学研究”的面目出现,做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自从攻读博士学位以至留校工作以来,我的学术兴趣自台港澳文学研究进而扩展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而实际上,中国(大陆)

^① 大陆学者中,以陈思和做得最好。与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相比,海外学者王德威在这一点上显然要来得更加元气充沛,得心应手。不过王德威的论述,又不以“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为旨归,而是包括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新马、北美)的华文文学。

现当代文学研究才是我学术基础的本业。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长期在本业和兴趣之间游走的结果,使我的研究论题铺得很开(想想看,是上下几百年,纵横整个世界的华文文学)且相当零散化——这是不利之处,可好处却是我在看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的时候,多了一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眼”。我发现,当我们在论述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之时,如果不再像过去那样持一种“大陆文学中心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台港澳文学的有机介入(不是台港澳板块的硬性拼贴),可能会对建立在“大陆文学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构成一种结构性的颠覆:原先在台港澳文学“缺席”的情况下很重要的问题,在有了台港澳文学的融入之后,可能不重要了或有所改变了,而原先不重要的问题却可能变得意味深长起来。比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启蒙”问题,在大陆范围内研究“启蒙”,论题相对单纯,线索也较明晰,可是把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涵盖进来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在曾经是殖民地的台湾和香港,殖民地时期的启蒙者是谁?被启蒙者又是谁?启蒙什么?启蒙以何种方式进行?这些问题的代入,无疑会对大陆现有的相关研究造成冲击,并改变已有的研究格局,改写某些结论^①。

这样的发现让我很兴奋,也决心要长期观察下去并有所阐发。不过,为了使自己并不总是是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我将“镜头”扩大和拉远,把海外华文乃至华人文学纳入视野,把中国大陆的现代

① 对此,赵稀方将有专文发表。此外,像新文学诞生之初的“新旧文学”论战,台湾、香港的情形也与中国大陆有所不同。如20世纪20年代连横在台湾对“旧文学”的坚持,在当时殖民地统治下,是有其维护中国传统、反对日本“同化”的积极意义的。如果简单地比照大陆模式,以单纯的“文学进化论”来看待台湾的“新旧文学”之争,将“旧文学”一概归为“落后的、保守的”“死文学”,很可能就会因罔顾具体的语境,而得出不尽准确的结论。

文学与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汇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因此,本书套用了陈思和的书名,论述范围却与王德威的研究视域相类似,即不再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将世界性的华文文学(中国大陆文学以及台湾、香港、东南亚、北美等不同区域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观照。当然,本书中的所谓整体和综合,只是相对而言,整体指的是范围(世界性的华文乃至华人文学),综合则是指书中各论题之间的关系是随机的,并不完全是指对某些问题的综合论述。本书的编排体例一如我在《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和《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两书中的结构形态: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形成某种不无整体意味的论域。

本书中的部分论文,曾经收录在《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和《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两书中,看过前两本书的读者,自可知道哪些是旧作,哪些是新撰,在新旧对比中,大概也可看出我这两年在学术上是否有所长进。

这是我独立撰写的第四本书。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学术道路,其间的寂寞、艰辛和坎坷,一言难尽。自己能坚持选定的学术方向走到今天,实在是亲人、师长、朋友扶持、帮助和鼓励的结果。我愿意以感恩的心情,向他们致谢!他们是:我的太太王静女士,苏州大学的徐斯年老师、范伯群老师、朱栋霖老师、曹惠民老师,南京大学的莫砺锋老师,复旦大学的陈思和老师,暨南大学的饶芃子老师,南师大的杨苾老师、江苏社科院的陈辽老师、汤淑敏老师,台港海外的师长白先勇老师、隐地老师、痖弦老师、聂华苓老师、曾敏之先生、王德威老师、李瑞腾老师、曾健民老师、寒山碧先生、Todd Armstrong 教授,以及朋友陶然兄、苏伟贞兄、陈义芝兄、李爽学兄、初安民兄、陈大为钟怡雯伉俪、封德屏大姐,我的同事亦师亦友的丁帆兄、张伯伟兄、张宏生兄、程章灿兄,学界朋友黎湘萍兄、赵稀方兄、朱双一兄、林幸谦兄,以及花城出版社的詹秀敏女士。

同时,衷心感谢我所在的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各位同仁对我的研究工作始终如一的理解和支持。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八年我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任短期驻院学者,我的相关研究得到了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以及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大力帮助,对此,我也要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叶子铭教授、副导师(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邹恬教授已归道山,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两位,以感谢他们的培育之恩。

目 录

前 言	1
“家”的颠覆与重建	
——以“父子关系”为视角看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变迁	1
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两种形态	
——施蛰存、欧阳子比较论	19
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新论	37
对“启蒙者”的反思和除魅	
——鲁迅《伤逝》新论	51
论张爱玲及其小说中的“不安全感”	59
论《现代文学》对台湾文学的贡献和影响	78
论两篇《古都》的精神形态及相互关系	92
论陈映真的“台湾文学观”	108
从《有缘千里》到《离开同方》	
——论苏伟贞的眷村小说	126
香港文学：从“地区”文学到“特征”文学	141

一种文学,多种看法

——香港文学研究的立场、论域和方法(1997—2007) 145

北美华文文学中的两大作家群比较研究 161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

——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178

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

——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 194

现代美文的杰出实践

——论白先勇的散文创作 210

斗争·爱情·语言

——论余曦的《安大略湖畔》 225

“历史”与“现实”:考察马华文学的一种视角

——以《赤道形声》为中心 234

附 录

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

——访白先勇 245